

# 谈历史人类学

今天回到母校(厦门大学)来,令我联想起许多事情,特别是想起当初陈国强、叶文程和蒋炳钊等老师建立人类学系的时候,我们被从历史系“瓜分”出来,进入人类学系学习,这一经历对我的学术研究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

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深深感到,厦门大学的人类学有一个很好的学术遗产,这份遗产是令他人羡慕的。遗产体现为一种精神。而我们可以说,厦门大学人类学的精神,是林惠祥先生的精神,林先生是东南地区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就我而言,林先生的人类学最精华的部分,在于通过民族史的研究指出中华民族是混合的民族,是“杂种”。第二个闪光的思想,是他关于算命研究,他首先提出,要破除“迷信”,首先要了解“迷信”,这为后来的民间信仰研究开创了政治学的道路。林先生的学术著作隐现着我们地方民众的心态,表达着地方民众的心智,而这些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谈到厦门大学人类学的学术传统,我们还应该提到傅衣凌先生。傅先生从“乡族”的概念,延伸出一种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也是从民间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他受到日本“左派”理论较多的影响)。

林惠祥和傅衣凌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一个很边缘的地带看我们的核心究竟如何,或者说,“从周边看中心”。他们关注一般民众的生活,都结合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傅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施坚雅的模式,卓有影响,但林惠祥先生的研究却不大为外人注意,实在遗憾。

林惠祥和傅衣凌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一个很边缘的地带看我们的核心究竟如何,或者说,“从周边看中心”。

“人类学的历史化”。

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人类学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而历史学中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倾向。

我今天想谈的主题,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从厦门大学的人类学传统延伸出来的。为了继承和发展,请允许我暂时避开学术传统,而集中一点注意力来探讨一下当代人类学的一个转型。这个转型是什么?具体指所谓“人类学的历史化”。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是由 Emiko Ohnuki-Tieney 主编的《经过时间的文化》(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一书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许多出名的人类学家为这本书撰写论文,包括 Edmund Leach、Marshall Sahlins 等,该书导论中提到,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人类学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而历史学中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倾向。还提到,人类学有理论眼光,而历史学注重细节和过程,两者有相互补充之处。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则是借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

尽管该书上述倾向的已言明的起点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Lewis 主编的 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一书,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人类学的古典时期。当时盛行的两种理论是进化论与传播论,它们都有着—个共同点,它们都没有脱离对文献的考察(当然,这主要是传教士和探险家的笔记,而且摩尔根是个例外,他在美洲的易洛魁印第安人中做调查),它们将人类学等同于考察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他们都是从西方的正统史观来看历史的。但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人类学出现了第一次重要的转变。我在许多地方谈到,在这个转变中出现了三个流派:一是英国的功能主义学派,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当代的东西,而不是历史的“残存”;二是美国的历史具体论学派,他们吸收了当时文化地理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将文化看成

是具体的东西,可以独立与政治、经济等其他体系而存在;三是英法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他们受法国社会学中年鉴学派的影响,发展出结构功能论,将社会类比于房屋,认为它是一个整体,抽取其间的一砖一瓦则整个楼房坍塌。三种理论和进化论一样,都将世界文化二元化:在进化论中,是历史和现代的对立,在后面三种理论中,则塑造出自我和他者的区别,东方与西方的差异。更严重的是,随着民族志方法的发展,文化变成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东西。三个流派共同的问题,也都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19世纪人类学将西方文化列于进化的顶端,而将这个“原始文化”列于文化进化的起始点;后者则将研究对象他者化。对它们的具体讨论,可以参阅费边的 *Time and Other* 一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身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埃文思-普里查德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人类学即是历史”的观点。他指出,人类学作为历史首先是一种叙述,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人类学的目的主要在于理解文化,是一种文本形态,是主观构建出来的关于文化的叙述,是“文化的翻译”,这与历史学将“历史过程写成历史文本”是一样的。埃文思-普里查德之后,部分人类学家意识到过程的重要性。同时,Lewis的 *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主张对部落社会进行有限制的历史考察,主张在小型社会群体和地区中考察王权、地域体系的历史等问题。

至70年代,人类学出现了第二次变化。世界史的观念重新被引进人类学。此期 Andre Gunder Frank 的依附理论(“dependent theory”)和法国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理论被引进人类学,在此框架内,讨论的主题变成世界在近代

三种理论和进化论一样,都将世界文化二元化:在进化论中,是历史和现代的对立,在后面三种理论中,则塑造出自我和他者的区别,东方与西方的差异。更严重的是,随着民族志方法的发展,文化变成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东西。三个流派共同的问题,也都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身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

至70年代,人类学出现了第二次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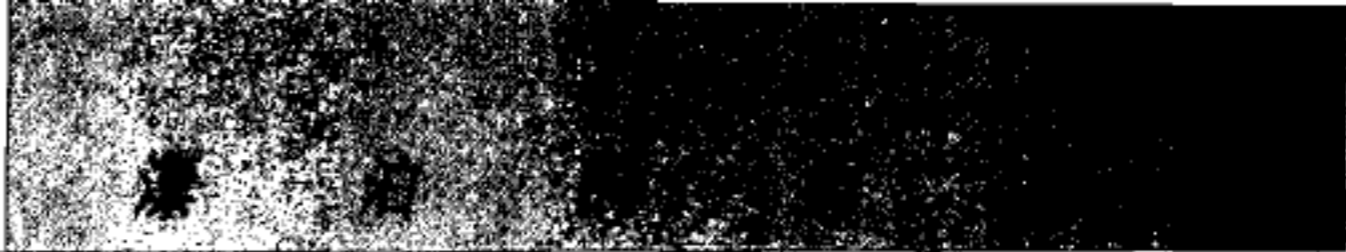
这时的人类学历史理论,已不同于进化论的历史,而是批判的历史。

这时期理论的缺点,在于将历史视为纯粹客观的存在。

80年代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对认同(identity)表示关注。

以来如何被糅合成相互依赖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时的人类学历史理论,已不同于进化论的历史,而是批判的历史。它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权力核心的成长与扩散。这种批判性的世界史的提出,使得既有的社会文化理论发生了危机。社会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封闭的、自足及纯粹的。文化也不是自律、稳定的死板一块或自成一体,而是处于不断的接触、冲击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之中。因此,在不同文化接触之间寻找分析点,全球化中的文化成为人类学分析的重点。这时期理论的缺点,在于将历史视为纯粹客观的存在。实际上,人不单是一个社会实践者,而且他们自身也在看历史,这种自我的观照,对于历史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后来的人类学家看到,在研究历史中,不但要研究客观的历史,更要研究人的主观的历史,两者应当结合起来。

80年代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对认同(identity)表示关注。这首先是在社会史中出现的,最早讨论的是民族主义。在1983年,同时出现了三本讨论此类问题的论著:一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虚构或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 London: Verso)一书,此书讲述民族主义的兴起,将语言、印刷业等当作营造民族主义的工具;二是Eric Hobsbawn和Terence Ranger所编的《文化的发明》(Invention of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一书;三是纪尔耐(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一书,该书指出了社会再生产(教育)对于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世纪,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触高等符号,而工业革命之后,教育文化的普及,一般庶民百姓皆可受教育,因而为塑造民族



共同体创造了条件。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支持了主观历史的研究。

在 Culture Through Time 一书中，充满着人类学内部的紧张关系，我在这里主要想到的是主观历史和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对于这一紧张关系，应当引起厦门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的关注。先说说案例。这是泉州港的历史发展。在 1985 年施坚雅于亚洲研究年会中所作的“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刊于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辑）演讲中，他用生命史的观点来看区域经济的兴衰，他特别举出泉州港兴衰的例子。他的意图是说中国历史是以区域性周期而不是以朝代为主导的。其结果是，在他的眼中，中国从来没有整体的历史体系，而是一个类似于联邦的东西。他没有看到“世界体系”对泉州的影响，也没有强调“市舶司”的设置对泉州的影响。而事实上，泉州的问题是，当时地方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泉州的兴衰正是与世界体系（在近代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亚洲也有自身的亚洲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其次，正如傅宗文教授所指出的，宋代泉州市舶司的设置对于泉州地方经济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影响。

泉州的兴起与早期移民史有关，在唐代泉州人口达到一定比例。当时出现了如何控制的问题，从而出现了行政体系，这是早于泉州成为大港。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到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呢？因为泉州处于边陲地区，这对于民间的商业精神和文化态度很有影响，泉州地方社会在唐宋时代即有文化多元主义的状态，这对于港口的兴起深有影响。至明代则出现相反的方向：缺乏文化宽容，也有对倭寇的恐惧，黄仁宇教授即指出明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特点是本土主义，其中的原因，我看是因为元代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朱元

主观历史与客观  
历史的紧张关系。

任何历史中都有两种意义上的历史的交互作用：一是社会经济的客观史，一是主观的思想史。两者，尤其是后者，对地方历史的演变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璋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心理，他想寻找汉人文化根源，他找到了宋代的程朱理学，把他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这方面来看，以后的海禁政策和在泉州设立里社铺境（铺设于边疆地区，似始于元代）乃至泉州港的衰落都于明初民族主义的初步兴起有关，由于被严格控制，因此泉州对外交通出现了一个比较“去合法化”的“黑暗时代”。

这个简单的说明，应得到更丰富的历史叙述。但它足以为我们说明，任何历史中都有两种意义上的历史的交互作用：一是社会经济的客观史，一是主观的思想史。两者，尤其是后者，对地方历史的演变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当然，我说到泉州这个案例，还想借此指出，上面提到的海外人类学的时代性变化及在这些变化中产生的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能用来丰富我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而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会为厦门大学人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风格化”产生好的影响。

林先生和傅先生如果在世，想必会反对我这样将“客观”与“主观”区分开来。但是，对我来讲，两位已故的伟大学者，其实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开拓了两条值得相互参照的道路。受美国的历史具体论学派影响较深，林先生更注重文化的历史，注重人们的信仰；而傅先生因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史的影响，更侧重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主张。两人各有风格，但就目前历史人类学的发展面貌来看，是可以在相互交融中发展成为一个综合论说的。

（原为讲座，蓝达居、刘永华、张宏明等录音整理，整理稿曾以“历史人类学”为名刊于《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第205期，1998年5月1日，现经修改。）